

方興未艾：學術界的中國男性史研究*

In the Ascendan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sculinity

何宇軒 (Kelvin Yu-hin Ho) **

一、前言

「過往學界曾長期視傳統社會女性為受害者，但這種觀念已經逐漸淡出，轉為強調客觀而理性地再現女性的歷史。他們以性別作為一項分析工具，挑戰既有的歷史敘述和解釋，以期將來的歷史為兩性所共有，所以歷史應該包括兩性的過去。」¹ 那麼，當我們重新客觀地審視古代兩性關係、權力分配等問題時，又會有甚麼新的視角？² 在一個父系中心社會裡，男性的自我要求是怎樣的？傳統社會又是否真的只優待男性？傳統學術界向來以父系、父權來形容中國社會，但是目前男性研究的方向正在不斷發展，已不再局限於這些層面。例如當代女性及性別史權威學者曼素恩 (Susan Mann) 提出在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領域之中，我們應重視「男性氣概」、

男性的人際關係、性別關係等議題。³ 男性研究是在女性研究的推動下發展出來的，與女性研究相輔相成，單單側重女性研究並不足以完全理解性別關係。⁴ 回顧過去有關中國男性史的研究，男性史研究方興未艾，但是筆者嘗試把相關研究歸納：學者的努力集中在幾方面，包括男性交友 (male friendship)、男性同性戀 (male homosexuality) 以及男性氣概 (masculinity) 等，但是各方面的研究仍然極具延伸探討的空間。

二、社會關係：男性交友

首先，在男性交友 (male friendship) 方面，關於「朋友」一詞的溯源，可參考郭守信的〈「士有朋友」——古代社會人際關係初探〉一文，他提出了「士有朋友」

* 本文原為筆者碩士論文『『夫道』——清代家訓所呈現的男性人格』（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哲學碩士論文，2013），發表時經過若干刪節，本文得以完成，筆者特感謝各位匿名評審對本文作出的寶貴意見、李師伯重及劉師詠聰的啟發與指導。

** 作者係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1 參劉詠聰，〈導言〉，收入劉詠聰編，《性別視野中的中國歷史新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 1-2。

2 當代女性及性別史權威學者曼素恩 (Susan Mann) 曾提出社會性別作為一種分析視角，可以打破學術研究中的無形壁壘，詳參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公司，2005），頁 380。而另一位性別史權威學者伊沛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亦指出「最好的婦女史不僅告訴我們歷史上的女人，婦女史挑動我們重新審視我們對歷史和歷史進程的理解」，詳參 Patricia Buckley Ebrey,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 L.A.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70-271。中譯文字據伊沛霞著，胡志宏譯，《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 239。換言之，以性別視角切入研究歷史，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歷史、認識歷史，所以面對古代兩性關係、權力分配等議題的探討時，我們需要更仔細地進行探究。

3 Susan Mann, "AHR Forum - 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5, no. 5 (December 2000), pp. 1600-1614.

4 周華山，〈誰來界定「男性特質」？〉，《性別越界在中國》（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2000），頁 43。

的概念，並從夏（約 2070-1600 B.C.）、商（1600-1046 B.C.）、西周（1046-771 B.C.）、春秋（770-476 B.C.）等時代去分析「朋友」關係的史實。郭守信提出了「士有朋友」這種人際關係所形成的思想及道德傳統，留下了忠君思想。他認為「主辱臣死」、「君亡臣殉」，以及「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的效忠觀念，並非由儒家創造，應從「士有朋友」這種人際關係去尋找，從中可以更深入了解朋友關係在中國歷史上的演變及其意義。⁵

另外，關於男性中不同性質的交友研究，有 Adrian Davis 的“Fraternity and Fratr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McIsaac Lee 的“‘Righteous Fraternities’ and Honorable Men: Sworn Brotherhoods in Wartime Chongqing”、曼素恩（Susan Mann）的“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及柯啓玄（Norman Kutcher）的“The Fifth Relationship: Dangerous Friendships in the Confucian Context”等等。Adrian Davis 指出兄弟關係中，兄長認同他們有權力指示弟弟，弟弟亦有責任去服從；⁶ McIsaac Lee 認為秘密社會中的男性關係是建基於忠誠、彼此承諾的責任。文學作品中《水滸傳》的男性群體，更是表現出金蘭兄弟的模範。但是，有學者認為這些秘密組織雖有反抗政府的行動，卻沒有明顯的政治性質；⁷ 曼素恩指出科舉制度亦使一班男性成為朋友，但又互相競爭。在官僚制度中，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會成為成功的關鍵；⁸ 而柯啓玄則認為男性之間的友誼只要處理得宜，可以為國家的需要而服務，但是這種人際關係是帶有危險性的。⁹

由此可見，男性交友大概可以分為家庭中的兄弟關係、秘密社會中的男性關係、科舉制度所形成的男性朋友關係，以及男性之間的友誼。從其分析層面而言，由家庭向外擴展，涉及社會關係，帶出不同層次的男性交友的討論。

除了以上的男性交友研究外，以明代（1368-1644）為研究時期，¹⁰ 有黃衛總的《明代中國的男性友道》（*Male Friendship in Ming China*）。黃衛總輯錄了不同學者的研究，例如有林萃青（Joseph S. C. Lam）的“Music and Male Bonding in Ming China”、何安娜（Anne Gerritsen）的“Friendship through Fourteenth-Century Fissures: Dai Liang, Wu Sidao and Ding Henian”及金葆莉（Kimberly Besio）的“A Friendship of Metal and Stone: Representations of Fan Juqing and Zhang Yuanbo in the Ming Dynasty”等等。

林萃青的“Music and Male Bonding in Ming China”提到音樂成為了一種渠道，從而建立男性友誼，並以明代為研究的時代，他指出了一些男性需要建立這些朋友網絡，談及彼此的男性身分及角色，例如明代皇帝，如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1506-1522 在位）、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1573-1620 在位）、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1621-1628 在位）等便需要這些男性網絡。¹¹ 何安娜的“Friendship through Fourteenth-Century Fissures: Dai Liang, Wu Sidao and Ding Henian”，研究的對象是戴良（1317-1383）、烏斯道（1376-1380）、丁鶴年（1335-1424），指出了他們建立的友誼是建基於文化上的

5 郭守信，〈「士有朋友」——古代社會人際關係初探〉（上）、（下），《文化學刊》2007.3: 142-150、2007.4: 145-153。

6 Adrian Davis, “AHR Forum - Fraternity and Fratr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5, no. 5 (December 2000), pp. 1630-1640.

7 McIsaac Lee, “AHR Forum - ‘Righteous Fraternities’ and Honorable Men: Sworn Brotherhoods in Wartime Chongqi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5, no. 5 (December 2000), pp. 1641-1655.

8 Susan Mann, “AHR Forum - 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pp. 1600-1614.

9 Norman Kutcher, “AHR Forum - The Fifth Relationship: Dangerous Friendships in the Confucian Contex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5, no. 5 (December 2000), pp. 1615-1629.

10 一些明代學者更認為朋友是五倫之中最重要的關係，詳參 Joseph P. McDermott, “Friendship and Its Friends in the Late Ming,” i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d.), *Family Process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92), pp. 67-96；呂妙芬，〈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誼〉，《漢學研究》17.1 (1999.6): 79-104。

11 Joseph S. C. Lam, “Music and Male Bonding in Ming China,” in Martin W. Huang, ed., *Male Friendship in M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07), pp. 70-110.

理想，有別於地區性、政治上的層面，何安娜認為男性友誼的建立，其重要性在於提供了一個空間，作為男性氣概中價值的分享及表達。¹² 而金葆莉的“A Friendship of Metal and Stone: Representations of Fan Juqing and Zhang Yuanbo in the Ming Dynasty”則從文學角度去分析，探討《詞林摘艷》中提到范巨卿（25-220）與張元伯（25-220）之間的友誼所呈現的現象及意義。¹³ 黃衛總的《明代中國的男性友道》，嘗試從男性的交友之道入手，從不同的層面去探討明代的男性交友性質，例如文學上的研究、歷史的層面、音樂的歷史等等，使男性交友方面的研究更加豐富。¹⁴

從男性交友的研究去觀察，筆者認為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近現代（例如明清時期），通論式的研究相對欠缺，或可嘗試從一些專題，例如文學上的研究，嘗試綜觀各個朝代有關交友的呈現方式，從而補充男性交友研究的不足。

三、性取向：男性同性戀

另外，有關男性同性戀（male homosexuality）的研究，數量較多，通論形式的有韓獻博（Bret Hinsch）的（*Passion of the Cut Sleeve: The Mal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張在舟的《曖昧的歷程：中國古代同性戀史》、劉達臨及魯龍光的《中國同性戀研究》、小明雄的《中

國同性愛史錄》等等。

劉達臨及魯龍光的《中國同性戀研究》是一本綜合古代、現代同性戀情況的研究。在古代的同性戀方面，分析了同性戀在不同朝代的概況，例如明清時期男色的泛濫，以至中國歷史上的女同性戀也有作出概述。作者更指出了男性同性戀於中國古代中在某程度上被社會認可，但是不能以此說明中國古代對性控制是寬鬆的。¹⁵ 而張在舟的《曖昧的歷程：中國古代同性戀史》，則集中討論中國古代同性戀現象的呈現，並提出了各個朝代同性戀的概況，例如隋唐五代宋元時期的「和緩」、以至清代的「盡顯」，可以深入地了解同性戀現象的變化。就男風而言，於遠古時期，雖然文獻不足，但作者總結了中國初民社會的同性戀是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內的興盛；另外，君主男風、臣民男風更是在不同朝代確切地存在，由此可見，男性同性戀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中是相當普遍。¹⁶

而韓獻博的《斷袖之情：中國男同性戀傳統研究》是首本討論中國歷史上同性戀情況的外文著作，討論了周朝至清朝的同性戀情況，例如漢代（206-220 B.C.）中不少皇帝都有男性戀人，當中漢哀帝（劉欣，27-1 B.C.；7-1 B.C. 在位）更欲把皇位傳給董賢（22-1 B.C.）；清代進一步對同性戀者作出規範，例如清代法律開始重視男同性性犯罪的問題等等。¹⁷ 當中，作者提出了一些觀點，例如中國的古典中，多以詩文形式去表達男性之間的同

12 Anne Gerritsen, "Friendship through Fourteenth-Century Fissures: Dai Liang, Wu Sidao and Ding Henian," in Martin W. Huang, ed., *Male Friendship in Ming China*, pp. 34-69.

13 Kimberly Besio, "A Friendship of Metal and Stone: Representations of Fan Juqing and Zhang Yuanbo in the Ming Dynasty," in Martin W. Huang, ed., *Male Friendship in Ming China*, pp. 111-145.

14 黃衛總亦有另文探討晚明的交友之道。詳參黃衛總，〈晚明朋友楷模的重寫：馮夢龍《三言》中的友倫故事〉，《人文中國學報》18 (2012.12): 225-238。

15 此著作也有分析現代的同性戀情況，詳參劉達臨、魯龍光，《中國同性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 1-2；另外，沿用這種從古到今的分析方法，也可參考 Ruan Fangfu, "Homosexuality: From Golden Age to Dark Age," in Fangfu Ruan, ed., *Sex in China: Studies in Sexology in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1), pp. 107-135，以男性同性戀及女性同性戀為分析的主題。

16 另外，作者亦提出了一些專題的論述，例如優伶男風、佛道及基督教的男風、福建一帶男風之盛等等，詳參張在舟，《曖昧的歷程：中國古代同性戀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頁 1-53。

17 Bret Hinsch,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The Mal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 (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34-55; 139-162.

性戀。¹⁸ 他認為古代中國中，主要是以社會中的角色、互動的關係，來認定雙方，以及雙方的性。¹⁹ 而小明雄的《中國同性愛史錄》也按照時代順序，論述周代至近代抗戰後的同性之愛，引用吳瑞元〈古代中國同性情慾歷史的研究回顧與幾個觀點的批評〉一文中的說法，作者從妻妾、男寵等下判斷，男性間之親暱關係，在社會中是容許的，不過要雙方情願。²⁰

至於從性文化的角度去探討男性同性戀，則有王書奴《中國娼妓史》、史楠《中國男娼秘史》、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的《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C. till 1644 A.D.*）、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Homoerotic Sensibil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秦起秀〈明末男色靡行的表現和成因〉等等。

王書奴《中國娼妓史》、史楠《中國男娼秘史》均以「娼」為主題，例如《中國娼妓史》，當中一些章節分析了男色於不同朝代所呈現的社會風氣，例如魏晉六朝（265-581）的男色，有寵男色而殺妻，在晉代是普遍的。公然狎昵幼童，由南朝至北朝，成為一種社會風氣。²¹ 《中國男娼秘史》，以主題方式分析各朝代的男色風氣，

例如兩漢淫風、宋明太監、大清的「狎妓女反作男娼」等等，兩本著作皆揭示了男色在中國性文化中的發展，男色更成為了社會風氣。²² 值得注意的還有高羅佩的著作，分析由西周以前至明朝的性文化發展，也涉及了男子同性戀的論述，例如對同性戀的發展作出了概括：漢代同性戀肯定多次流行，六朝早期似乎極為興盛，在北宋（960-1127）也再度興盛過。²³

而集中探討明清時期的男色風氣，如前文所引，秦起秀分析了明中葉至明末的男色風氣，例如出現了閹割幼童以供人取樂的社會風氣、禁嫖使士大夫把娛樂對象轉為男性、福建等地男色風氣之盛，這些男色靡行的表現，成為了當時的社會風氣，見證了明代中葉至明末在性文化上的發展及概況。²⁴ 而吳存存指出了男性同性戀在晚明和清代的社會，不是個別現象，是一種普遍風氣，例如晚明社會上出現了男性同性戀賣淫專營場所，清代京城出現了相公私寓制等等。²⁵ 士人對同性戀持寬容態度，認為它與異性戀一樣是一種正常的性愛方式，狎童、優伶成為了生活中的最大快樂。²⁶ 另外，明清的男性同性戀是可以劃分為主動的及被動的兩個階層，主動階層是有錢、有地位的階層，被動的則是地位低賤、屈從和賣淫的階層，出於功利目的。²⁷

18 同上註，頁 7。

19 同上註，頁 7-8。另參吳瑞元，〈古代中國同性情慾歷史的研究回顧與幾個觀點的批評〉，收入何春蕤編，《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頁 165。

20 小明雄，《中國同性愛史錄》（香港：粉紅三角出版社，1997）。另參吳瑞元，〈古代中國同性情慾歷史的研究回顧與幾個觀點的批評〉，頁 167。

21 另外，明代的男色，男娼嗜好，普及於民眾。明代娼妓亦以雞姦行為，獻媚游客；而清代的男色，士大夫狎優伶，於道咸年間，北京男娼極盛等等。詳參王書奴，《中國娼妓史》（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頁 60-65、226-230、304-313。

22 史楠，《中國男娼秘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

23 此著作在研究中國古代性文化方面，被西方漢學界公認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權威著作，詳參高羅佩著，李零、郭曉惠等譯，《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 66-67；Robert Hans van Gulik and Paul R. Goldin, eds.,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C. till 1644 A.D.* (Leiden: Brill, 2003)。

24 秦起秀，〈明末男色靡行的表現和成因〉，《文教資料》18 (2007.6): 114-116。

25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 3。補充一點，此研究中提到晚明士人對同性戀的寬容及肯定，可從文學家、詩人、名士們的言行去發現。詳參吳存存，〈明清社會男性同性戀風氣〉，《明清社會性愛風氣》，頁 114-226。

26 同上註，頁 4。

27 同上註，頁 8。

再者，利用文學作品探討「男色」風氣的著作甚多，不勝枚舉。²⁸ 總括而言，需要注意的有施曄《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何志宏〈男色興盛與明清的社會文化〉、袁書菲 (Sophie Volpp) 的〈規範色慾：17 世紀的男色觀念〉(“Classifying Lust: The Seventeenth-Century Vogue for Male Love”)、魏矚安 (Giovanni Vitiello) 的 “The Dragon’s Whim: Ming and Qing Homoerotic Tales from The Cut Sleeve”、 “The Forgotten Tears of the Lord of Longyang: Late Ming Stories of Male Prostitution and Connoisseurship”、 “Exemplary Sodomites: Chivalry and Love in Late Ming Culture”、《浪子的朋友：中華帝國晚期的同性戀及男性氣概》(The Libertine’s Friend: Homo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等等。²⁹

施曄的《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是一本綜觀各個朝代中同性戀文學書寫發展的著作，例如有《史記》、《漢書》中的大漢男風；魏晉南北朝文學中如《世說新語》寫的男色；晚明男色小說《龍陽逸史》、《宜春香質》、《弁而釵》的專論等等。另外，作者亦把同性

戀文學作出比較，例如《姑妄言》與《紅樓夢》同性戀書寫的比較等等，令讀者從不同層面去透視同性戀現象的文化，也可從文學角度中以通論的形式去了解男性同性戀的呈現。³⁰ 而何志宏的〈男色興盛與明清的社會文化〉嘗試歸納明清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現象，例如男色的類型，包括歌童和優伶，外貌氣質都傾向柔媚化；而這些小說多屬於「色欲小說」，但是可以發現這些作品仍洋溢著一種追求「至情」的思想，是情先於欲。這些觀察讓我們從文學的角度去了解中國歷史上男色的呈現，也從文學作品中反映社會的風氣。³¹

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文學作品，從而探討「男色」風氣，如前文所引，有袁書菲及魏矚安的研究。袁書菲認為雖然學者利用文學作品、野史紀錄去證明，在晚明以至清初，社會接受同性戀的情況，但是仔細閱讀相關的文字，當同性戀成為討論對象，出現邏輯上的矛盾。³² 魏矚安以清人吳下阿蒙所編之《斷袖篇》為主要的史料，從而分析明清時期有關同性戀的作品，亦證明了此類作品的繁多不是巧合，反而帶出了當時社會接受同性戀的

- 28 詳參黃勇生，〈男性情愛的想像與期待——論《品花寶鑑》〉，《宜春學院學報》2008.1 (2008.2): 86-89；小謝，〈二百年道行，毀於男色——從《閱微草堂筆記》看清代同性戀〉，《書城》2008.10 (2008): 64-66；陳靜梅，〈男越女界：論晚明兩部同性戀小說集的性別意義〉，《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2007.4 (2007.7): 119-123；林雨潔，〈男男色小說研究——以《龍陽逸史》《弁而釵》《宜春香質》為本〉（宜蘭：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林慧芳，〈《弁而釵》、《宜春香質》與《龍陽逸史》中的男色形象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張瀛太，〈照花前後鏡，情色交相映——《品花寶鑑》中的男色世界〉，《中國文學研究》13 (1999.5): 227-247；周淑屏，〈清代男同性戀文學作品研究〉（香港：私立能仁書院碩士論文，1997）；何大衛，〈明末清初的「男色」風氣與笠翁之文學作品〉，《中國文學研究》19 (2004.12): 133-158。
- 29 Giovanni Vitiello, “The Dragon’s Whim: Ming and Qing Homoerotic Tales from *The Cut Sleeve*,” *T’oung Pao*, vol. 78 (1992), pp. 341-372; “The Forgotten Tears of the Lord of Longyang: Late Ming Stories of Male Prostitution and Connoisseurship,” in J. De Meyer and P. Engelfriet, eds., *Linked Faiths: Essays on Chinese Religion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Honour of Kristofer Schipper* (Brill: Leiden, 2000), pp. 227-247; “Exemplary Sodomites: Chivalry and Love in Late Ming Culture,”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vol. 2, no. 2 (April 2000), pp. 207-257; *The Libertine’s Friend: Homo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30 施曄，《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31 作者採用的作品，例如有《金瓶梅》、《宜春香質》、《弁而釵》、《龍陽逸史》；清初小說則採用李漁的小說；而明清色欲小說中的男色情節，有《繡榻野史》、《浪史奇觀》等等。詳參何志宏，〈男色興盛與明清的社會文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 44-45。
- 32 袁書菲亦指出「男色之道」並不是 17 世紀、20 世紀作者們概括就能解釋。男風被形容為特異，並加以規範，然而作者認為男色在話語中的中心位置，不代表人們的寬容，也不代表男色的普遍性。詳參 Sophie Volpp, “Classifying Lust: The Seventeenth-Century Vogue for Male Lov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1, No. 1 (June 2001), pp. 77-117。另參袁書菲，〈規範色慾：17 世紀的男色觀念〉，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381-389。

情況，當時男性用以滿足其性的慾望；³³ 魏騶安亦發現，在晚明的小說中，「俠」的友道，除了是一種男性友誼，有時會發展成為「同性戀」。「俠」亦會把男性之間的同性關係，視為自然的發展，不會拒絕彼此的性關係。³⁴

從男性同性戀的研究去觀察，筆者發現男性同性戀的盛行發生在明清時期，故此這時期的研究成果很豐富；然而，從文學的角度去討論男性同性戀，都側重在明清時期；通論性質的只有施曄的《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於其他朝代探究文學作品、甚至中國與西方的文學作品中男性同性戀呈現的比較等等，有關的研究仍有補充的空間。而筆者亦認為男性同性戀的研究中，釐清西方「同性戀」觀念、定義與中國「男色」或「男風」之間的差異也是必須的。³⁵

四、自我認同：男性氣概

男性氣概（masculinity）的研究源自西方，周華山指出自 60、70 年代女性主義對父權制的抨擊，使學者反思父權制對自身的影響，並深入思考長久以來父權制如何塑造、建構特定社會文化的男性形象及男性特質。³⁶ 周華山認為男性化與女性化、男子氣、男子漢都是特定歷史、文化的產品，是因時地而變異的流動概念。而且，西方大部分男性研究的英語著作，以書名為例，就堅持以眾數的 masculinities，從而突顯男性形象及身分是多元、不一而足的。³⁷ 就男性氣概的研究而言，這些西方

的著作甚多，從不同的層面去分析男性氣概，屬於一般性的理論。³⁸

而以中國社會及文化為主題分析男性氣概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有黃衛總的《中華帝國晚期的男性構建》（*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宋耕（Song Geng）的《文弱書生：中國文化中的權力與男性特質》（*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雷金慶（Kam Louie）的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韓獻博的“Male Honor and Female Chastity in Early China”、Joanne D. Birdwhistell 的《孟子與男性氣概》（*Mencius and Masculinities: Dynamics of Power, Morality, and Maternal Thinking*）、管佩達（Beata Grant）的“Da Zhangfu: The Gendered Rhetoric of Heroism and Equ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an Buddhist Discourse Records”、Susan Brownell 及 Jeffrey N. Wasserstrom 合編的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周華山的《性別越界在中國》等等；同時，不能忽略的是以近現代中國戰爭的歷史為主題分析男性氣概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有王詩穎《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1924-1945》。另外，以中國的文學作品去探討男性氣概，有謝鵬雄《文學中的男人》、范揚《陽剛的墮沉：從賈寶玉的男女觀談中國男子氣質的消長軌跡》、陳少華《閹割、纂弑與理想化：論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父子關係》、曾佩琳（Paola Zamperini）的《失身：中國小說中的賣淫與男性

33 Giovanni Vitiello, “The Dragon's Whim: Ming and Qing Homoerotic Tales from *The Cut Sleeve*,” pp. 341-372.

34 Giovanni Vitiello, “Exemplary Sodomites: Chivalry and Love in Late Ming Culture,” pp. 207-257. 魏騶安認為男性友誼成為了男性之間情愛的基礎，相關的討論詳參其新著作《浪子的朋友：中華帝國晚期的同性戀及男性氣概》（*The Libertine's Friend: Homo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2011），頁 53-92。該研究亦從不同層面探討男性同性戀與「男性氣概」、「情」等概念的關係，例如男妓的普遍現象、浪子的「男性氣概」形象如何轉變等等，是極具貢獻的學術著作。

35 何大衛，〈明末清初的「男色」風氣與笠翁之文學作品〉，《中國文學研究》19（2004.12）：137-138。

36 周華山，〈誰來界定「男性特質」？〉，《性別越界在中國》，頁 43。

37 同上註。

38 西方的男性氣概著作甚多，難以詳列，詳參 Harry Brod,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The New Men's Studies* (Boston: Allen & Unwin, 1986); Michael S. Kimmel, *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7); Peter F. Murphy, *Feminism and Masculinitie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Michael S. Kimmel and R.W. Connell, eds.,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2005)。

氣概》(*Lost Bodies: Prostitution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Fiction*)、楊雨的〈中國男性文人氣質柔化的社會心理淵源及其文學表現〉、段江麗的〈「傳統」中的「現代性」——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審父」意識〉等等。

就一般性的理論而言，筆者嘗試歸納出男性氣概的一些要點。首先，男性氣概的定義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意義，是可轉變的概念，是建基於社會及文化。³⁹ 另外，男性氣概的定義大致上有一套相似的特點，縱使不同的國家及文化會有差異，⁴⁰ 例如男性氣概是男人有能力控制周遭事物、男人在困境時比女人堅毅；⁴¹ 男子氣概是一種責任，真正具有男子氣概的男人會盡自己最大努力擴大自己的榮譽，在公共領域內贏得光榮和尊敬。⁴² 男人只有在能夠做到某些事，控制某些事、自己或女人時，才會覺得自己有男子氣概；好男人必須致力於「自我改進」，例如鍛鍊、紀律、努力工作、節制嗜好、無懼困難等等。⁴³ 而肯尼斯·克拉特鮑 (Kenneth C. Clatterbaugh) 的《男性氣概的當代觀點》(*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 更提出了不同團體或立場下對男性氣概所作的定義，例如「保守主義」認為男子氣概

源自男性內在天性，或文明戰勝了自然；「擁女主義者」認為男子氣概是社會理想及刻板印象造成的結果；而「男權運動團體」則認為男子氣概是面對社會角色對個人的矛盾要求和男性相對無權力的情況所做的因應。⁴⁴

再者，男性氣概是規定的、理想的概念，而非描述男性的實際情況，是男性自我及男性群體認同的理想，⁴⁵ 由此，可以思考男性氣概，大致上是一種理想的層面，到底男子在社會立足，以至在家庭的角色，是否可以完全達成這些對男性性別上的要求？周華山以美國社會把男性文化視為一種權力關係去分析，指出「霸權男性特質」(hegemonic masculinity) 的概念的結果就是「男人雖然是父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但男人同樣是父權的受害者」。⁴⁶ 總括而言，男性氣概是一種理想的性別模式，具備可變的特質，不同的社會、文化、時代，男性氣概的定義也有相異之處。而筆者亦認同男性氣概其實是相對的概念，男性化與女性化並不是自存的本質觀念，而是彼此依賴的相對關係。⁴⁷

以中國社會及文化為主題分析男性氣概的著作，如前文所引，黃衛總分析了在儒家影響下明清時期男性氣

39 詳參 Peter N. Stearns, *Be A Man!: Male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0), p. 249; Larry May, *Masculinity and Moral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50-151; 曾立煌,《男人本色》(香港:基道出版社,1999),頁12-13; Christopher E. Forth, *Masculinity in the Modern West: Gender, Civilization and the Body*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3; Todd W. Reeser, *Masculinities i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Chichester;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0), p. 218。

40 例如溫柔的白面書生是傳統中國的理想男性形象，但在美國卻被視為缺乏陽剛味的娘娘腔。詳參周華山,〈誰來界定「男性特質」?〉,《性別越界在中國》,頁43。

41 曾立煌,《男人本色》,頁12-13。

42 皮埃爾·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劉暉譯,《男性統治》(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頁69。另參 Victor J. Seidler, *Unreasonable Men: Masculinity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17。

43 山姆·基恩 (Sam Keen) 著,張定綺譯,《新男人:21世紀男人的定位與角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頁167-173。

44 肯尼斯·克拉特鮑 (Kenneth C. Clatterbaugh) 著,劉建台、林宗德譯,《男性氣概的當代觀點》(臺北:女書文化事業公司,2003),頁347。

45 Martin W. Huang, *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185; Harry Brod 亦認為男性研究的發展會從男性的真實生活入手,詳參 Harry Brod,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The New Men's Studies*, p. 16; Peter N. Stearns 認為沒有男人可以完全達成男性性別要求,男性在性別上的責任是可以轉變的,詳參 Peter N. Stearns, *Be A Man!: Males in Modern Society*, p. 249。

46 周華山,〈排斥女人與一切「女性化」價值的霸權男性特質〉,《性別越界在中國》,頁47。

47 同上註,〈誰來界定「男性特質」?〉,頁43-45。

概的建立，並運用儒家典籍、政治論著、小說作品等方面加以論述，例如，英雄及好漢在《三國演義》、《水滸傳》中的呈現，真英雄可以犧牲自己的妻子以保護朋友，表現出「兄弟如手足，夫婦如衣服」的男性氣概。⁴⁸ 作者認為這些著作中都呈現了男性的憂慮。⁴⁹ 另外，宋耕嘗試從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探究才子的形象，指出當時的男性對社會性別的建構與政治文化之間緊扣的關係。宋耕更指出近代中國前的社會性別是以權力為基礎的，因此男性文人在身體上的了解（例如性特徵），也與政治有所關連。⁵⁰ 而作者亦認為傳統的中國文學中，反映了男性幻想、恐懼及男性對社會及文化的看法，指出了男性主導的社會，視女性為男性網絡的一種威脅。⁵¹

再者，雷金慶認為男性氣概不只是等同父權制，而是從父權社會所建立的性別規律，故此男性氣概需要更細緻的考究。⁵² 雷金慶解釋了在中國社會中存在的兩種男性氣質：「文」與「武」。「文」強調的是文化上的內涵，溫文爾雅的男性氣質，例如才子、文人；「武」則帶有剛強、尚武氣質，更有一種武俠形象，強調的是身體上的力量。「文」與「武」的分別在於這些尚武俠士都以承諾、義氣為重，不太重視兩性情欲，男性之間的

交友尤其重要。⁵³ 作者亦提出了傳統中國及西方所定義的男性氣概，帶有分歧的元素，例如中國傳統的男子有英雄、好漢、才子、文人，然而西方的男子漢強調體格上的健壯。⁵⁴ 韓獻博提出了男性榮譽及女性貞節的問題，貞節的出現與男性榮譽彼此相應，並非沒有關連。在早期中國，男性氣概文化的體現，例如男性保持個人聲譽、避免恥辱，重視個人行為及操守，追求義、忠、勇等等。再者，義多與男性有關，但是女性嫁了給男性，女性也需遵守，故此女性不但要行為、舉止得宜，也不能使丈夫的榮譽及名聲有所損失。⁵⁵

Joanne D. Birdwhistell 的《孟子與男性氣概》提出孟子的哲學及政治思想蘊含了母性的想法，作者認為孟子自小失去父親，在母親的撫養下形成了母性想法。另外，作者又指出孟子對兩種表現「男性氣概」的形式提出爭議，其一是農業性質的「男性氣概」，如神農氏；其二是自我中心的「男性氣概」，如魏惠王（姬瑩，400-319 B.C.；369-319 B.C. 在位）。Joanne D. Birdwhistell 亦申述孟子所論的理想男性人格帶有陰柔特質，例如統治者對待百姓就如百姓的父母，需具備關懷、培育等等，包含了母性的想法。⁵⁶ 由此可見，孟子的哲學及政

48 Martin W. Huang, *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131-132. 黃衛總更進一步提出研究家訓文獻是很好的切入點去審視「男子氣概」，他亦採用了少許家訓的著作作為分析，如汪輝祖（1731-1807）的家訓等，但是筆者認為在搜羅家訓文獻上仍可擴大搜索的範圍，詳參 Martin W. Huang, *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187-190. 有見及此，筆者在黃衛總的研究基礎上得到啟發，並著力搜羅清代家訓文獻，並以「夫道」為核心，撰寫了『夫道』——清代家訓所呈現的男性人格為碩士論文。過程中，曾觸及清代男性的「夫道」及其管理家中女性成員關係的概念。透過梳理清代家訓、文集等不同文獻，發現清代男性對如何彰顯「夫道」、如何達到「齊家」之道已建立了一套丈夫的守則。與此同時，筆者亦發現清代男性除了享有不同的權利及地位，也面對不同層面的規範及性別壓力。

49 *Ibid.*, p. 199.

50 Geng Song, *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1-172.

51 *Ibid.*, pp. 3、178.

52 Kam Louie,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

53 *Ibid.*, p. 77.

54 *Ibid.*, p. 8-9.

55 Bret Hinsch, "Male Honor and Female Chastity in Early China,"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vol.13, no. 2 (September 2011), pp. 169-204.

56 Joanne D. Birdwhistell, *Mencius and Masculinities: Dynamics of Power, Morality, and Maternal Think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p. 1-6.

治思想中同時存在「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的特點。管佩達則從佛教的角度，提出了男性對於「大丈夫」的追求，「大丈夫」蘊含了個人道德的要求，體現了男性氣概的呈現，女尼的自我修身，也以「大丈夫」作為借鑒。⁵⁷ 而 Susan Brownell 及 Jeffrey N. Wasserstrom 合編的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也提出了中國歷史中男性氣概被定義為與其他男性的競爭（身體上、精神上），而女性氣質則與性愛的互相吸引、生殖上的成功有關。⁵⁸

而以近現代中國戰爭的歷史為主題分析男性氣概的著作，如前文所引，有王詩穎《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1924-1945》。該研究的對象是國民革命軍，研究的主要時段則涵蓋北伐之前的黃埔軍校、北伐戰爭、剿共戰爭及抗日戰爭。王詩穎強調此研究不限於戰爭及衝突的描述，而是以男性研究的角度，在話語、意識形態及文化意涵方面，分析「男性氣概」在國家、軍隊、知識份子，以至女性角色各方面是如何形塑出來的。王詩穎以戰爭結合「男性氣概」進行研究，可以讓學界重新思考以性別視角分析戰爭史的方法。軍人

的形象及其建構，本身就呈現出「男性氣概」的典範。另外，作者加入女性角色來輔助分析「男子氣概」，除可收相輔相成之效外，也有助重申「性別研究」不能只集中某一性別，要考慮到不同性別的立場，才可更有效地呈現出整體的性別面貌。⁵⁹

另外，以中國的文學作品去探討男性氣概，有前文所提及范揚的研究，描寫的對象是賈寶玉在《紅樓夢》的具體形象及個性，范揚提出了男子氣質是一種文化的衍生物，也可能就是文化本身。⁶⁰ 一個具體男子的氣質，未必就是男子氣質，男子氣質往往是由傳統的男性角度來界定的，滲入了社會對男性的評價。賈寶玉在「男子要以大男子自居、正人君子自居」的社會，是一種對性別角色的逃避。⁶¹ 楊雨則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規定了男性「陽剛」的性質，然而在形象上往往也偏向於柔順謙卑。⁶² 曾佩琳指出了晚期帝制中國的小說，以妓女的生活為題材，去表達社會及政治的訊息及取悅讀者。⁶³ 作者認為小說中的妓院，是男性的世界，關於妓女題材的閱讀及寫作，是晚清男性了解其性別身分的重要環節。⁶⁴

57 Beata Grant, "Da Zhangfu: The Gendered Rhetoric of Heroism and Equ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an Buddhist Discourse Record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vol. 10, no. 2 (September 2008), pp. 177-211.

58 Susan Brownell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s.,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 (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364.

59 王詩穎，《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1924-1945》（臺北：國史館，2011）；另參拙文〈書評：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1924-1945〉，《歷史人類學學刊》10.1 (2012.4): 162-165。

60 范揚，《陽剛的墜沉：從賈寶玉的男女觀談中國男子氣質的消長軌跡》（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頁2。

61 同上註，頁33、201。

62 楊雨，〈中國男性文人氣質柔化的社會心理淵源及其文學表現〉，《文史哲》2004.2: 107-112。陽剛和陰柔是我們常用的哲學概念。追溯歷史，《易經》中有「陰陽」觀，對於兩性關係已有所探討，詳參中國伙伴關係研究小組、閔家胤，《陽剛與陰柔的變奏：兩性關係和社會模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18-22。例如《周易·繫辭》便提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參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阮元〔1764-1849〕《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第七，〈繫辭上〉，頁76。「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概念確定了男女的關係：男性是乾，女性是坤；男性是陽，女性是陰，男女與「陰陽」、「乾坤」等詞語連繫起來。陽剛、陰柔是一對的哲學及審美範疇，陽剛與陰柔是相對的，參謝舒妹：〈陰柔陽剛說新探〉，《瓊州大學學報》6 (2004.12): 71。綜觀現存有關陽剛文化、陰柔文化的研究而言，學者多從哲學思想、文學作品等方面去探討陽剛文化、陰柔文化，筆者亦嘗試從個別的文學作品探討陽剛及陰柔文化，例如拙文〈韓愈詩文的性別內容〉亦嘗試從個別文學家韓愈（768-824）的男性書寫，探討其作品之中除了呈現陽剛風格，筆下書寫的女性形象亦有其「柔性」一面（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中古史研討會〔2012.5.25〕宣讀論文；另刊於《中正歷史學刊》15 (2012.12): 63-94)。

63 Paola Zamperini, *Lost Bodies: Prostitution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Fiction*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p. 17.

64 *Ibid.*, pp. 104、186.

男性對妓女題材的想像，也反映了男性氣概的表現為恐懼、憂慮、男性期許的想法（與女性的關連）。⁶⁵

五、總 結

綜觀學術界的中國男性史研究，大致上有三個類別，分別是男性交友、男性同性戀、男性氣概，不難發現，男性史的研究有很多補充的空間。以男性氣概為例，筆者認同雷金慶的說法，關於中國男性氣概的學術著作仍然很少，而男性氣概亦需要更細緻的考究。⁶⁶就男性史研究的增補而言，黃衛總亦嘗試提出一些中國「男性氣概」中可以再仔細研究的方向及問題，例如傳統文人轉變為現代的知識份子，當中的中國男性經歷了甚麼性別的轉變？又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傳統的「英雄」及「好漢」形象又如何幫助我們重新發現不

同形態的「男性氣概」？⁶⁷筆者認為這些議題極具延伸討論的價值。

筆者亦嘗試提出一些建議，例如男性在社會關係的建立方面，實際上也包含了五倫的關係，例如在兄弟關係之中，如何「為人兄」、「為人弟」是值得關注的，兄弟關係的討論也有益於男性交友的認知；⁶⁸另外，男性同性戀的研究，屬於男性的性別取向，是同性關係。由此擴展，繼而討論兩性關係，⁶⁹例如「父女」、「夫婦」、「母子」等等，也有助我們理解中國古代同性關係及兩性關係建立的差異、男性的性別取向是否受到兩性關係建立的影響等等。由此觀之，男性史的研究，仍有待發掘及補充。回到本文的主題，探究性別內容不應只集中在有關「女性」的論述上，「男性」的研究亦極具延伸討論的價值，也能彌補只以「女性」作為中國性別歷史研究對象的不足。

65 同註 63，頁 77。從研究視角看，曾佩琳這本著作甚具新意，確實可為現有的「娼妓」研究、以至「娼妓」與中國文學結合的研究帶來補充的空間，讓學界重新思考妓女題材小說與男性千絲萬縷的關係，因為無論是讀者群、作者，還是小說中的角色，大多都是男性。基於這個現象，作者認為小說中的妓院是男性的幻想世界；閱讀這些小說及寫作，可讓晚清男性了解其性別角色。作者重申以上的觀點，也讓我們反思「性別研究」不應只局限於「女性」，學界也應關注「男性」的自我性別認知。參拙文〈書評：Paola Zamperini's *Lost Bodies: Prostitution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Fiction*〉，《漢學研究》30: 4 (2012.12): 351-356。

66 Kam Louie,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pp. 3-5.

67 Martin W. Huang, *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203.

68 例如在五倫關係中，學者較少注意兄弟關係的討論。筆者嘗試觀察學界的最新動向，在 2013 年 3 月 21 日至 24 日於美國聖地牙哥舉行的亞洲研究學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年會中，各學人藉此交換學術成果。當中討論的主題，亦涉及兄弟關係的探究，該主題名為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Xiong and Di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Elite Culture"。在此會議中，學者以中華帝國晚期的兄弟關係為探討核心，其主要討論對象為菁英文人，例如楊慎 (1488-1559)、王世貞 (1526-1590) 等等，從而更進一步分析兄弟之間的角色、關係。詳參 <http://www.asian-studies.org/conference/> (亞洲研究學會年會網頁)。

69 詳參中國伙伴關係研究小組、閔家胤，《陽剛與陰柔的變奏：兩性關係和社會模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賈麗英，《誰念西風獨自涼：秦漢兩性關係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丁文，《莫教空度可憐宵：魏晉南北朝兩性關係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劉燕儷，《唐律中的夫妻關係》（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鄭雅如，《情感與制度：魏晉時代的母子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1）；廖宜方，《唐代的母子關係》（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熊秉真，《建構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子關係》，收入盧建榮主編，《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中國新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頁 315-341。由此可見，探討兩性關係的著作不多，相關研究亦見不足。